

黃冕堂 著

明史管見

明史

明史管见

黄冕堂 著



21044969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五年·济南

1044969

明 史 管 见

黄 冕 堂 著

齐 鲁 书 社 出 版 发 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344 千字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300

书号 11206·101 定价 3.05 元

前 言

个人从事明清史教学已三十年，追随老辈学者以明史为重点，涉足了一定的领域，积累了不少资料。其中仅有一小部分用以撰成散篇刊发过，或者被吸进讲稿之中。但大半仍被长期置于书篋之中，积牍堆几盈篋，却未发挥更多的积极作用，诚有“桑蚕吃叶而不能吐丝”之嫌。现将历年的阅读所得加以整理总结，纂缀成篇，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学习可有二途：一者刻苦自学，不断总结提高。二者就正有道，或以文会友，相互交流切磋，求得抛砖引玉。与此同时，亦愿为历史的教学、科研略尽绵薄。

在编写中，鉴于个人对明史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因此，决定只对其中十一个较重大而自己又涉猎较多的问题，予以综述。这十一个问题又大体可以区划成如目录分卷所标明的四个范围的内容。其中约十分之六的篇幅为经济史，其余则分属于元明之际的政治、元末和明末农民起义、朱元璋的评价和明帝国的中衰与社会危机等相关的内容。其论一条鞭法一篇，因篇幅过大，权将同一论题的内容分为上下两篇。全稿共四卷计十二个篇目。

个人治史，酷爱资料。历来最怕搞无米之炊，也不愿抓住一两条未必典型的材料，便大做文章，高谈阔论。剖析问题，尽量避免孤立举例的办法，争取在较翔实的资料基础之上，由

此及彼，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反复辨析，纵横钩校，并适当运用图表方式，务期揭示出问题的各个方面和来龙去脉。在运用资料上，个人还十分赞同司马光氏纂辑通鉴长编时所确定的原则：宁失于繁，无失于略。因为，失于繁，虽难免流于冗杂，但只要能防避多而寡要，读者尚可各据所好，或不嫌其繁，或自为沙汰、取舍，还有补救弥缝的可能。失于略，大海遗珠，以至挂漏，则没有任何挽救的余地。杜著《通典》，自倡体大思精，简而得体，但某些学者反病其简略过当。马氏《文献通考》，清儒猛烈抨击其取舍不精，但亦有喜其征引广博，网罗宏富者。二者各自成家，互有短长，争妍媲美，似不必强求一致，亦不宜妄为轩輊。

学贵创新，这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优秀传统和一种可贵的精神。但如何创新？何谓创新？人们的认识难免发生歧异。杰出的学者顾炎武大力倡导创新，他对明末学界的萎靡不振和陈陈相因的陋习，甚为不满，坚决鄙弃。但尤其使顾氏深恶痛绝的是弥漫当时社会的寡廉鲜耻之病和空虚躁竞学风。他大声疾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用知耻立为人作为学之本，以博学多闻，下学上达，痛砭空虚之学。顾氏不仅这样说，而且坚苦力行，熔汇九经诸史诸子百家与乎千百年的浩繁文献于一炉，加以间关万里，躬亲穷索，著为《日知录》诸书。峻发新议，闳阔奥赜，独树一帜。但凡所论说，无不博稽广采，山崇海阔。盖由博反约之自然，非揠苗助长所强致。当时有人催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答曰：经历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用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历史，这是史学领域的彻底革命，只要马克思主义学习得好，大大小小的研究成果，都将赋有程度不等的创新意义。但恩格斯说：

“即使只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 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

因此，创新是一种艰苦而谨严的科学研究结果，是容不得半点调皮的。同时，学术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不能分割，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二者都存在着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关系。对于前人已有的学术成就，既要虚心学习，又不能落其窠臼。只有善于用前人的丰富研究成果充实和武装自己头脑的人，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才能谈到真正的突破和创新。创新有大小，一条资料，一个论点，一个问题，一个方面等，都可以作出大小不等的创造性贡献，重大问题的规律性认识和总结性突破，是在充分学习前人的基础上又积自己无数辛勤的小发明才能以获得成功的。王安石的登飞来峰诗句云：“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只有登高，才能望远，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山峰塔顶为登高者提供了超凡绝俗的眼力凭借，但无论是山和塔都需要登高者一步一步去攀登，人们不是飞上去的，也不可能一步登天。个人治史和撰写此稿，惟希望对前人或今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作到尽好的学习和总结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进求在论述或资料上能有点滴的新议或发掘。对于至今未曾或较少涉及的论题，则力求有所补充或补白。对学界继续有争论的问题，亦大胆发表个人的看法，不回避矛盾，以利学术争鸣。实事求是地估量，由于作者才学不逮，此稿以下学成分居多，上达者少。

此稿非明史的一代全编，即以所论述的十几个篇目而言，亦仅属一孔之见，一得之愚。因此，对有明近三百年的历史考察，是名副其实的管中窥豹，还可能有不少错误。统以此向各方求教。

著 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于济南

山东大学新校南园谨志

目 录

前 言

卷一 元明之际的政治与朱元璋的评价1

论朱元璋的起兵及其渡江初的南京政权1

论元末农民起义与朱元璋成功地建立明王朝.....59

论明初的制度和政策100

卷二 贵族庄田与地主田庄

论明代贵族庄田的土地问题159

论明代贵族庄田的主佃关系和封建剥削197

论明代地主田庄的封建经济结构234

卷三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

论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条件和明代资本主义的

萌芽.....261

论明代商业资本的二重性310

明代物价考略346

卷四 明帝国的中衰与社会危机

论明代的一条鞭法(上)	373
论明代的一条鞭法(下)	426
论明代后期的社会危机和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历史 背景	462

卷一

元明之际的政治 与朱元璋的评价

论朱元璋的起兵及其 渡江初的南京政权

多年来，史学界对农民起义的理论和朱元璋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朱元璋的经历与刘邦一样很不平凡，某些侧面甚至更为奇特。他们两人都是由下层农民通过农民起义的阶梯而登上皇帝宝座的，这是基本相同处。其不同者：刘邦出身于泗上亭长，朱元璋则出身于赤贫的农家和流浪僧徒，早年身世更为悲惨、曲折；刘邦的活动处于我国封建制的初建之时，朱元璋则处于封建制的后期；刘邦反对的是汉族地主政权秦王朝，朱元璋反对的则是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元蒙政权。因此，人们对研究朱元璋的历史，特别是洪武建国前的历史更感兴趣，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例如：农民有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朱元璋参加起义初有没有皇权主义或帝王思想？朱元璋是由农民起义领袖蜕变而成的封建皇帝，还是本来就属郭子兴地主武装的一员，因而根本不存在蜕变问题呢？朱元璋的初期南京政权是否有个演变过程？如果有演变过程的话，则以何时为断限比较合适等等。本文试图以研究洪武建国前的南京政权的性质为中心，并对其渡江前的若干有争论的问题，予以必要的追溯和探赜。

(一) 青少年时期的朱元璋 及其思想

朱元璋是一个由赤贫农民转变而成的封建皇帝，那么，他在参加反元起义前和举义初有些什么思想？有无皇权主义呢？有的同志根据《龙兴慈记》的记载，著录朱元璋幼时，“与群牧儿戏，以车辐版作平天冠，以碎版作笏，令群儿朝之，望见俨然王者”。这位同志没有说明讲这个故事是何用意，但给人的印象却是看牛娃已有了皇权思想。元明之际的文人为朱元璋这个布衣天子编造神话传说格外卖力，有的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有的巧为粉饰，锦上添花；有的荒诞不经，离奇可笑。上述牧童故事，真真假假，或有或无，即或有之，最多反映统治阶级的出人头地的思想对劳动人民以至儿童的某些不良影响，不一定是劳动人民的思想主流和本质的东西。那么，根据唯物主义关于“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基本原理，渡江前的朱元璋的主导思想究竟是什么？它与当时和历史上的农民和农民军思想有何共同之处？

第一，刻苦耐劳，自食其力。朱元璋祖祖辈辈均以农业劳动为生，自己青少年时期主要也是以农为业，两度入皇觉寺为僧，给老僧干活，特别是临近起义的后四年，即朱元璋二十至二十三岁之时，他经常“还旧里，修葺淳皇、太后坟墓，经理穴圯，潜居草野四载，往来濠城”（《天潢玉牒》），实际上主要过的不是寺院中的消闲生活，而是劳动生涯和务农。祖辈的家传和现实的生活，从小培养了他能吃苦耐劳的思想。这种思想通过他当皇帝以后的几次谈话具体地反映了出来。洪武元年、二年，

连岁饥荒，“民命濒危”，因此，勾起了他对十余年前的辛酸记忆，说“因念微时，皇考皇妣凶年艰食，取草之可茹者杂米以炊，艰难困苦，何敢忘之”。至是决定“具草蔬粝饭与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艰，以答天谴”（《太祖实录》卷39）。此中所谓“以同民艰”无疑是一种粉饰，其真实目的在于防止人民反抗。洪武十八年，他对“侍臣曰：保国之道，藏富于民，民富则亲，民穷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自昔昏主恣意奢侈，使百姓困乏，至于乱亡。朕思微时，兵荒饥馑，日食藜藿。今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未尝一日忘怀，故宫室器用，一从朴素，饮食衣服，皆有常供，惟恐过奢，伤财害民也”（《太祖实录》卷174）。这些文献生动的记述了朱元璋当农民时的困苦生活，也充分反映了他对“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忧心冲冲。然则朱元璋对这种农家生活的态度如何呢？他说：“吾昔微时，自谓终身田野间一农民尔”。又曰：“朕本布衣，昔在田里，赖承平之乐”。又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太祖实录》卷16、47、53）。由此可见，朱元璋在未参加起义前是不怕吃苦，以农为乐，安心于农业生产劳动的，愿意终身通过农业劳动以自食其力。这种吃苦耐劳的思想在他参加农民起义以后不久也还继续保持着。至正廿七年，他因免太平、应天、宣城诸郡租赋，对中书省臣“叹曰：吾昔在军中，尝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太祖实录》卷17）。我们知道，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以后，很快便成了郭的亲信、女婿兼重要部将，人们普遍称“朱公子”。以“朱公子”的地位是完全可以搞点特殊待遇、吃点好东西的。但他没有这样作，甘愿与士兵一样，饿着肚子出战，回来吃粗粮。为什么能这样作呢？因为他少年时期，缺吃少穿，吃糠咽菜，是司空见惯的事，早有锻炼。参加农民

军，虽然当了头目，但在一定时期内仍不愿忘本，不愿脱离士兵群众，这一点，在下面还要专门论述。刻苦耐劳与自食其力是劳动人民高尚品德的两个方面的表现，这两方面表现有着本质的联系。关于自食其力的思想通过朱元璋后来对其祖先功德的追忆更加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反映，他说：

“昔朕皇考尝言：凡人守分植材，如置田地，稼穡收获，岁有常利，用之无穷。若悖理得财，如贪官污吏，获利虽博，有丧身亡家之忧”（《太祖实录》卷69）。又曰：“朕家本业农，祖父皆长者，世承忠厚”（《太祖实录》卷27）。

实录同卷一开始也大赞元璋先世皆“勤俭忠厚，人称长者”。朱元璋的姊丈曹国公李贞在起义前的经历和起义后的思想性格与元璋有许多相似之处。李贞于洪武建国后，祖孙三代（子文忠、孙景隆），备极荣显，朱“以勤俭化天下”，李贞率先响应，“衣取适体，食惟适口”，甚至补缀旧衣，继续使用，其在答谢朱元璋的大量封赠时说：“臣生长田畴，服勤稼穡，惟知食力，何望显荣”（《太祖实录》卷120）。上述许多话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般农民的固有思想，也反映了朱元璋早年的固有思想。

第二，反抗封建暴政。朱元璋说：“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如何致富呢？用朱元璋父亲的话说：“凡人守分植材，如置田地，稼穡收获，岁有常利，用之无穷。若悖理得财，如贪官污吏，获利虽博，有丧身亡家之忧”。就是说，赞成劳动发家，反对剥削致富。洪武二年，他对群臣说：“……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其在自制《皇陵碑》中细述了自己参加反元起义前曾有过剧烈的思想斗争，但终究

以革命思想战胜了落后思想，认识到“果束手以待罪，亦奋臂而相戕”。洪武元年，在其致元国公白琐住的书中亦云：“朕本淮右布衣，遭时抡擢，不能宁居，遂仗剑而起”（《太祖实录》卷38、75）。我国古代劳动人民不仅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而且是不能容忍黑暗势力统治因而富于革命传统的，朱元璋继承了这个传统。

第三，平等待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反对封建等级思想。如上所述，朱元璋参加农民军不久，随即由亲兵、九夫长、镇抚、总兵官、左副元帅等阶梯急剧高升，而且是深受郭子兴宠爱的“朱公子”，地位变化如此之速，但他却仍旧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至正十三年，他“身先士卒”，一举攻下滁州，“凡军中有所得”，皆无所取，“辄令分给群下”。至正十六年，元璋取太平，“富民陈迪献金帛”，亦随即以之“分给诸将士”（《太祖实录》卷1、3）。同时在太平获得大量仓储之后，还实行开仓济贫政策，使受粮者“人马云集”（《天潢玉牒》）。这类措施与历史上农民军的开仓济贫和明末李自成在荥阳大会上提出的“子女玉帛惟均众”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听说有的世袭武将虐待军士，乃“特敕谕之”曰：

“朕观国初诸老成将官初起兵时，收抚士卒或一二十人，或一百人二百人至四五百人，必以恩抚之，亲如兄弟，爱如骨肉，故攻战之际，诸士卒争先效力，奋身不顾，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称其善战，而不知由其善抚士卒，故能如此。甚至疾患扶持，服劳奔走，一如子弟之于父兄，无不尽心”（《太祖实录》卷191）。

这段资料充分反映了朱元璋义军中许多官兵间普遍存在的平等关系，这也是朱元璋的军队所以能每战必胜的一个重要原

因。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不仅存在于他的部将与士兵之间，而且朱元璋本人首先为部将树立了平等待人和“善抚士卒”的榜样。洪武二十二年，西安前卫指挥使王纲“从征云南，辄逼死军士，又哀敛金帛诸物”，朱元璋坚决下令将王纲处死，并曰：

“昔天下未定，朕亲身战征，与士卒同甘苦，未尝以非礼加之”（《太祖实录》卷197）。

第四，私有观念和封建迷信思想。这种思想一般农民都有，朱元璋也不例外，在某些方面可能更为严重。朱在十七岁入皇觉寺为僧以前终年为地主放牛种地，吃大苦、耐大劳，尔后七年则是过着较为复杂的生活，虽仍饱经风霜，亦未完全脱离农业劳动，但社会影响是混杂的，不仅有白莲教的影响，而且有孔孟和儒家学说的影响，历史记载朱元璋“西游庐六光固汝颖诸州，如此三载，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皇朝本纪》）。此中“立志勤学”显然是指读孔孟和儒家书籍。这在某种程度上滋长了他的私心和其他消极思想，这也是朱元璋在参加起义前所以发生反复动摇的思想根源。

（二）朱元璋的皇权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朱元璋有无皇权主义或帝王思想呢？我的看法是也有也没有，其情况颇为复杂，要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当他还是一个穷苦农民和流浪僧徒，当其参加红巾起义羽毛尚未丰满之时，其主要思想是以小私有为特点的劳动人民意识，如上所述，这种意识有其刻苦耐劳，自食其力和憎恨封建剥削、封建压迫等革命的一面，但也有狭隘自私、封建迷信等消极的一面。后者

虽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一个潜伏的祸根。后来伴随客观环境和朱元璋自己地位的变化，特别是接触了儒士李善长、冯国用等以后，其思想乃发生迅速蜕变，以南京政权的建立为标志宣告了朱元璋称王图大业和重建汉族地主政权的帝王思想已初步定型。农民是最讲求实际的，我们不能设想他们在救死不暇和寄人篱下、听人驱使的环境下还有心幻想一步登天当皇帝。朱元璋自己在其建立南京政权特别是建国后，曾多次大发感慨，追忆自己早年的苦难身世和思想活动，并涉及到了对当日反元“群雄”的某些评议，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朱元璋在回顾元末天下大乱，群雄竞起时，各种人物出现于政治舞台，不少人确乎是有功名心和政治野心的。吴元年，他在致书元陈州守将左君弼中说：

“天下兵兴，豪杰并起，岂惟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于乱世”（《太祖实录》卷17）。

洪武元年正月，方国珍归顺，心怀恐惧，元璋特意慰抚之曰：

“草昧之时，英雄角逐，人熟不欲有为，亦谁能视帝王之有真者，其为去就，不能无所齟齬，尔之所为，亦何足责”（《太祖实录》卷25）。

洪武元年十一月，他在伤悼反元死难将士，表示不忘同济艰难之心时曰：

“始者将士相从，皆望成功以取富贵。今天下已定，生者既膺爵赏，而死者不可复作，吾岂须臾而忘之，故幽恤其家”（《太祖实录》卷33）。

根据上面议论，我们可以得出下面几点认识：在奋起反抗元朝的“群雄”之中，有的人确乎有功名富贵之心，甚至野心勃

勃，在自己身份卑微之时，痴心妄想，觊觎皇帝宝座。有的人是“乘时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进攻与退守二者兼有。有的人欲有所为，但对前途如何，“天命所向”，把握不定，因此不作非分之想，但亦不轻易曲驾相从，投靠别人。至其说：“始者将士相从，皆望成功以取富贵”，这是他当了皇帝以后的一种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的结果，这种说法是夸大的、歪曲的，与朱元璋自己在前面所说的话相矛盾，徵诸客观事实，也不尽相合。前面说过，朱元璋的姊丈李贞是始终跟随元璋到处征战，颇著劳绩的，其早年的思想是“惟知食力，何望显荣”。朱元璋参加起义，与先行参加郭部起义军的友人的动员和劝说有一定的关系，那个友人参加起义也不是图什么功名富贵。至正十二年二月，当元璋到处避难，在十字路口苦闷徬徨之时，有故人自“乱雄”中以书来招曰：“今四方兵乱，人无宁居，非田野间所能自保之时也，盍从我以自全”（《太祖实录》卷1）。很明显，这个友人是因为兵荒马乱，不能宁居，希望投奔革命以图生存，求得生活出路，而且他希望朱元璋也持这种想法。

不仅如此，方国珍、张士诚最初举行起义，也主要不是功名富贵之心所驱使，而是由于奋起反抗，结怨了地主和官府，死里求生。至正十六年，张士诚致书朱元璋曰：“始者，窃伏淮东，甘分草野，缘元政日驰，民心思乱，乘时举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邮，东连海濡，番官帅并力见攻，自取溃散，杀其平章实理门、参政赵伯器，遂成深仇”。至正十九年，方国珍奉书朱元璋曰：“国珍生长海滨，鱼盐负贩，无闻于时，向者因怨构诬，逃死无所，遂窜海岛，为众所推，连有三郡，非敢称乱，迫于自救而已”（《太祖实录》卷4、7）。钱牧斋的《国初群雄事略》和《明史》本传所记略同。他们的叛变革命，接受元廷的高官美爵，